

一代人的觉醒： 朦胧诗的潜伏与崛起 (1973-1979)

陈大为

摘要：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可说是遍地开花，虽然还威胁不了官方诗坛及其审美机制，只在白洋淀诗歌群落等小圈子里酝酿，潜伏着巨大能量。直到 1978 年“今天派”横空出世，交出多首划时代的诗篇，震撼了一代知青，迅速崩解了主流诗歌的审美传统，自然也动摇了某些诗界大佬的地位，遂引发新旧世代诗人之间的战火，后来的诗史称之为“崛起的诗群”。本文分别以《白洋淀》的芒克、“归来者”与“今天派”的斗争、写下《一代人》的顾城为代表，勾勒出 1970 年代地下诗歌的酝酿与崛起，作为朦胧诗“前史”的三个观测点。

关键词：白洋淀诗群；芒克；今天派；顾城；朦胧诗

作者：陈大为，台北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诗歌史、马华文学、21 世纪华文玄幻及武侠小说。邮箱：wei0928@gm.ntpu.edu.tw。

Title: The Awakening of a Generation: The Submergence and Rise of Meng-Long Poetry (1973-1979)

Abstrac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derground poetry flourished in small circles, such as the "Baiyangdian Poetry Community," though it posed no direct threat to the official poetry scene and its established aesthetics. Despite its limited reach, this underground movement harbored immense potential. In 1978, the "Jintian School" emerged unexpectedly, producing epoch-defining poems that captivated a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dismantled the aesthetic traditions of mainstream poetry, and challenged the status of established poetic leaders. This sparked a conflict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of poets, later referred to as An Emerging Poetic Generation in poetry his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ang Ke of "Baiyangdian,"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Returnees" and the "Jintian School," and Gu Cheng's iconic work "The Generation", to explore the brewing and rise of underground poetry in the 1970s, offering three key perspectives on the "prehistory" of Meng-Long poetry.

Keywords: Baiyangdian Poetry Community; Mang Ke; Jintian School; Gu Cheng; Meng-Long Poetry.

Author: Chan Tah We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history,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21st-century Chinese fantasy and martial arts novels. Email: wei0928@gm.ntpu.edu.tw

前言

1968年12月，毛泽东用“上山下乡”的奇谋把数以百万计的知青送出城市，一举消弭了沉重的就业压力，文革立即少了一股脱缰野马般的肃杀之气，至少知青圈子褪去了刀光剑影，有些人沉溺到黄皮书和灰皮书的世界，有些人重组文革前盛行一时的艺文沙龙，在私密的小空间里孕育“后文革”时代的文学种子。最著名的是1962年张郎郎（1943-）和友人组成的“太阳纵队”，是新中国最早的地下诗歌沙龙；翌年又有郭世英（1942-1968）等人组成的“X诗社”，但它们随即被政治黑手扑灭，成为两则文革结束后才重见天日的珍贵史料。话虽如此，各路人马还是热络地互相往来，成就了文革“地下文学”盛世。这些地下诗人的写作史和阅读史，影响了后来的诗歌史论述，固然添了史料，却也添了诸多事实考证的困扰。在众多艺文沙龙当中，北京近郊的“白洋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白洋淀的天空

1967年，芒克（1950-）、多多（1951-）、根子（1951-）同时从北京三中初中毕业，这三个同班同学在1969年一起到白洋淀的淀头村插队，这片由三百个湖泊组成的沼泽地带，离北京两百多哩

路，说远不远，刚好脱离政治的魔爪，加上位置适中，偶然形成一个非常自由的文学与艺术交流平台，吸引了邻近几个省分的文学知青。白洋淀虽然成为京畿一带地下诗歌的圣地，但以交流为主调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对当代诗歌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无法对当下的诗歌美学的发展产生即时的影响。直到多年后，学者才发现“‘白洋淀诗群’相对于‘今天派’有一种前史的关系，不少后来追认的‘朦胧诗’代表作，便是源出于此”¹，芒克三人的诗史评价因此水涨船高，几乎所有提及芒克的评论都会引用《天空》（1973）的开章前三句：

太阳升起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²

芒克似乎在宣告“太阳”从一个毛泽东和共产党御用的象征物，转变成暴力符号，它普照的天空尽是血迹，看似普照长空，天空却为了抵御它而付出沉痛的代价。对政治符号进行意义抽换，流露出芒克对现实的反思。不过，太阳的“去神格化”在芒克同期诗作里并不多见，大时代的政治反思不是芒克的诗歌的主调。他是抒情的，最独特之处在于他对城市的归属感，是这一代人比较欠缺的。

芒克生于沈阳，1956年举家搬到北京，在此渡过童年和少年时期，1969年1月插队到白洋淀也没受多大的苦难³，第一年大半年时间跑回北京，后来读了《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他和

-
- 1 亚思明：《大海深度放飞的翅膀：北岛与〈今天〉的文学流变》，台北：秀威出版社，2020年，第85页。
 - 2 芒克：《天空》，《今天》，1978年第1期，第24页。这首诗在日后另有修订版，此处所引用原版。
 - 3 芒克说：“我在白洋淀呆了七年，基本没怎么干活，……我们那管得不严，爱干不干，等于躲风头，没受太多苦。比老百姓好一点，有吃有喝，鱼虾都能弄到，有时偷偷下网，或者别人下网他们给弄出来，反正白吃呵呵。要说苦就是冬天冷，没炉子没火，睡觉要戴着棉帽，但实际上没受什么大苦。”详见王士强：《芒克访谈录：从〈白洋淀〉到〈今天〉》，《中国南方艺术》，2018年4月18日，网址：<https://www.zgnfys.com/m/a/nf-rw-55094.shtml>，检索日期：2020/09/09。

彭刚共组“先锋派”，展开一段狼狈不堪的流浪岁月。芒克对北京有很深的归属感，每次从白洋淀往返北京都有一番感触，他的百行长诗《回家》（1973）写的正是这回事：

他受伤的眼睛前是一排铁栅栏，
透过打滚的早晨
朦胧的城市像一个孩子一样
拼命地在母亲枯萎的胸膛上寻找粮食。

冬天头一次地放声痛哭，
穿过新年简陋的门槛，
他闭起了眼睛……
挨了打的城市露出了像婴儿一样的青屁股。

天空像一只眼睛的大灰猫，
低垂的云——
这猫的软绵绵大尾巴
软弱无力地抖下了上面的雪花，

他头顶着雪花。
沿着一缕黑烟的影子走着，
每一个路过的地方
那大群的像帐篷一样的坟头
点缀着旷野的荒凉。
他走进了城市。
城市好像是在夜晚流了大量的口水，
每一条街都是一层光溜溜的冰。⁴

北京这座城市以孩子形象在当代诗歌里登场，是十分罕见的，非但摆脱了大地之母的刻板图象，也消除了历史文化的累赘，以及长期沦为政治符号的各种隐喻。北京，在芒克心目中有了一种无以

4 芒克：《重量：芒克集 1971-2010》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年，第29-30页。

名状的亲切感。老北京跟自己穷困的童年记忆互相交叠，饥饿、贪吃、顽皮，流出来的口水隔夜都结成满街道的冰。二十三岁的青年诗人芒克，在冬天早晨回到孩童般单纯的北京老家，渴望看见它的青屁股。回家真好。此诗最重要的句子在“当太阳用长长的手臂 / 抱紧了蓝色的城市 / 无数种音响忽然在蓝色中飘荡”⁵，太阳是单纯的，形象正面，不沾政治；北京也是单纯的，呈现美好的天空蓝，这跟“太阳升起来 / 天空血淋淋的 / 犹如一块盾牌”的美学运作简直是南辕北辙。芒克很认真在写回北京的感觉，他的抒情很小，纯粹是个人的抒情。

芒克是大时代里的独行者，写下很多个人化的姿态和声音，在1973年的中国诗歌史地表上屹立不摇。芒克从未打算走进人群，或任何一个适合起义的广场，所以他的诗歌很难掀起排山倒海的影响力，跟他互取笔名的诗友北岛（1949-）则刚好相反。但一个时代不必只保存一种声音，芒克的诗歌写作路线，在（当时的）工农兵诗歌跟（后来的）启蒙诗歌两大浪潮之间，自有其价值。

日后成为传奇的白洋淀诗歌群落，是一个自由、松散的艺术沙龙，在风格和思想上既没受郭路生的影响，也没影响他人，各路知青诗人在此各取所需，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白洋淀三剑客”当中，最早离开的是根子，他在1972年被招聘到北京中央乐团，多多因感染肺炎而长期待在北京养病，只有芒克待到1976年1月才回京。连他们自己也想不到白洋淀将来会写进文革诗歌史最明亮的位置。

二、崛起的诗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爆发悼念周恩来暨抗议四人帮的天安门诗歌运动、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这个动荡不安的年分，绝对是地下诗歌大规模崛起的契机。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算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复苏时期，毛死了，四人帮垮台，饱受文革摧残的中国诗坛从十年严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重获创作的自由。这时候，以艾青（1910-1996）为首的“归来者”复出诗坛，在美学理念和写作风格上，跟

5 芒克：《重量：芒克集1971-2010》，第30页。

以北岛为首的新锐诗人起了磨擦。

当时比较能够接受新锐诗人的是中坚世代，1977年进入《诗刊》工作的王燕生（1934-2011），在1980年夏天和邵燕祥（1933-）合办了“第一届青春诗会”，推选了十七位新锐诗人到北京亮相，请老诗人讲课。十七年当中包括了舒婷、顾城（1956-1993）、江河（1949-），但基于某些因素，北岛、芒克、杨炼（1955-）成了永恒的遗珠⁶。“青春诗会”成了诗坛新人靠拢主流诗坛的重要舞台，也成了诗坛的黄埔军校。这一场世代交接（而非交替）的诗会，很容易让人产生天下太平的错觉。

重执牛耳的归来者，位居主流的发言权和陈旧不堪的诗歌美学，很快便成为年轻诗人前进诗史的障碍；加上被“传统的新诗”长期奴役的学者，也不能接受年轻一代的诗风，于是北岛等人的诗被贬称为“朦胧诗”⁷，在诗界前辈和学界保守势力的双重压制下陷入苦战，“围绕‘朦胧’，意见相左的双方似乎都有意要把它视为一种美学原则或根本的诗学特征加以褒赞或贬抑，他们从本质上把握到这类诗歌的性质，并据此做出价值优劣的评判”⁸。简而言之，一方将朦胧贬为负面的阅读反应指标，另一方则奋力建构崭新的诗歌类型（有别于张口见喉的十七年诗歌，贬抑之词反而成为颠覆性的美学特征）。在这个备受前驱诗人压制的生存环境里，富有攻击性的反权威的言论才是上策，而且势不可挡。一场官方诗坛与地下诗坛的诗歌冲突随即展开。

以中国作协副主席艾青为首的卫道派老诗人拥有官方媒体的发表优势和组织优势，他们运用组织力量对今天派诗人，以及朦胧诗美学的建构者与支持者，进行长达三年的围剿。朦胧诗最终获得全国广大读者的支持而成为最后的赢家，开启了一个属于年轻诗人的

6 有关本届诗会的详情，可参阅杨娇娇：《第一届“青春诗会”与1980年代初诗坛格局的转向》，杭州：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7 出身西南联大的九叶派诗人杜运燮（1918-2002）在《诗刊》1980年第1期发表了一首《秋》，章明（1925-2016）后来在第8期刊出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指责此诗的种种缺失。章明以“红色赞歌”起家，眼界低俗，看不惯杜运燮的诗风是合理的。“朦胧诗”之名，立马成为保守分子对现代主义诗歌的贬词，另一方面又成为有识之士捍卫现代主义诗学的标竿，双方在此展开拉锯战，无形中确立了“朦胧诗”的代表性。

8 柏桦、余夏云：《“今天”：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27卷第1期，第45页。

“新诗潮”，以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五人为代表的“朦胧诗人”更吸引了整个华文创作世界的目光。

“朦胧诗”是一个话语权争夺战的战果，它不仅仅是诗歌美学上的界定，更多是约定俗成的归类。顾城的说法最为生动：“‘朦胧诗’这个名字，很有民族风味，它的诞生也是合乎习惯的。其实，这个名字诞生的前几年，它所‘代表’的那类新诗就诞生了，只不过没有受过正规的洗礼罢了。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类新诗时，它已经渡过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它叫什么名字呢？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现代新诗、朦胧诗、古怪诗……后来，争论爆发了，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学名了，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折中，‘朦胧诗’就成了大号”⁹。北岛比较属意“今天派”，他总觉得“‘朦胧诗’是官方的标签，那年头我们根本无权为自己申辩”¹⁰。“今天派”是“朦胧诗”的核心成分，但身为创刊人之一的芒克没被列上“朦胧诗”五大将或主要名单，舒婷则不在《今天》发表诗作，所以“今天派”的界定也有一些模糊地带。

作为战果的“朦胧诗”，实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一个类（division），它涵盖了北岛、江河、杨炼等“今天派”诗人的诗作，以及风格相似的同时期诗歌，并非所有朦胧诗都出自《今天》作者群。作为“朦胧诗”核心的“今天派诗歌”，是较小的亚类（subdivision），它的代言意识和抵抗意识最为强烈，可是连北岛自己也写了好些柔软的抒情诗。疆界划分，无法壁垒分明。

以“今天派”为中心的朦胧诗，固然展现了新兴的诗歌美学与创作风格，要是没有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1932-）那篇独具慧眼的《在新的崛起而前》（1980）、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孙绍振（1937-）推波助澜的《新的美学在崛起》（1981）、诗人徐敬亚（1949-）建构朦胧诗美学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新诗的现代倾向》（1982）的理论支援，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获得主流诗坛和学界的认同。“三崛起”因“违背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资

9 顾城：《“朦胧诗”答问》，收入廖亦武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10 查建英：《北岛笔谈》，《八十年代访谈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产阶级自由化的流毒”，受到全国主流媒体和诗人的全面性批判，尤其徐敬亚惨遭上百万字的言论攻击。历经多番围剿而不倒，“三崛起”终于开创了新一代的诗歌审美标准，成为中国当代诗史的重要关键词，每一部新撰的诗歌史都必须论及它们的影响力（这种以理论支援创作的革命模式，数年后启发了第三代诗人的裂变，以及他们在1990年代的文学史版图保卫战）。新一代的朦胧诗人终于站上主流文坛和文学史的舞台，归来者再度归去，黯然隐没在朦胧诗炫目的光环背面。

1985年，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了由老木（1943-2020）主编的《新诗潮诗集》（1985），老木以独到的诗歌审美眼光和过人的选稿胆识，成就了这部划时代的诗选，一年内狂销两万部¹¹。这部上下两卷合计813页的选集里清一色是年轻诗人，归来者被取消了，朦胧诗站稳了阵脚，为全部有机会展读此书的年轻读者开启了诗歌盛世的一扇天窗。¹²

诗人的创造力，和诗选主编的创造力同样重要，里应外合，宛如魔鬼通过粉碎而创造，没有创造性成果就不足以印证他（们）的力量。朦胧诗的裂变不仅仅是运动的结果，它确实建立了一套崭新的诗歌美学，将固有主流诗歌美学降格成过去式。

“今天派”和朦胧诗的登场，象征着一代人在自我和人文精神

11 老木、海子、骆一禾、西川在1980年代初合称“北大诗歌四剑客”，老木1986年获硕士学位，1993年执教于北大。西渡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这套书的影响：“我刚进北大不久，就在学三食堂门前买到一套影响我很长时间的《新诗潮诗集》，包括诗选上、下册和诗论一册。这套书的编者是中文系1980级的诗人老木，本名刘卫国。我个人认为，这套书迄今仍然是“朦胧诗”的历史成绩最好的检阅和总结。在我们这个一向忽视历史资料积累的国家，这套完全由学生编选（老木其时刚从北大毕业），并由学生社团主持出版的（该书为北大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的一种，但未见这套丛书有其他图书出版）、总篇幅达1000页的诗集就显得特别可贵。可以说，北大1985年以后的文学氛围是和这套书有密切关系的。同时，它也影响到那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大学校园诗歌。”详见西渡：《传奇的开篇——北大诗人的故事》，《西湖》，2017年第10期，第95页。

12 熊原在老木过世后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他以一人之力，编选了这套《新诗潮诗集》，就像在开篇我所感慨的宜宾那样，长江只有到了宜宾，才开始叫做长江。中国现代诗歌，到了老木这里，才开始百川汇海，恣意浩荡，洋洋大观，气象万新。”详见熊原：《中文系失传的烟斗跑到哪里去了》，《初岸文学》，2020年11月29日，网址：<http://twgreatdaily.Com/B1grL3YBjdFTv4tAfcro.html>，检索日期：2020/12/01。

上的觉醒，以及对文革以来的文化专制之反扑。

三、黑色的眼睛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顾城发表了只有两行的短诗《一代人》（1979），简直是一次核爆等级的启蒙：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¹³

跟顾城一起在逆境中成长的一代人（特别是知青），都见识过文革颠覆伦常、泯灭人性的阶级斗争，见证过无孔不入的政治迫害与算计，见识过文字狱和处决，他们的眼睛（和心灵）全遭到黑暗现实的污染。顾城却用这双来自黑暗、穿透黑暗、超越黑暗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用它被文革磨练出来的洞悉力，去寻找遥不可及的民主和自由。全诗只有两句，却震撼天下人心。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 1945-）认为：“顾城使用三个双音词‘黑夜’、‘寻找’和‘光明’叙述了历史，准确地说是一代人的心灵史。这一代人冲破了黑暗，但同时他们自身又是由要摆脱的黑暗构成，因而他们的寻找注定附有沉重的原罪。这一点在顾城生命中成为恐怖的现实，他永远无法寻找到光明，最后以一种自己曾经不齿的杀人凶手的方式辞世”¹⁴。此诗能够震撼广大的诗歌读者，正因为它道出这一代知青的“命运回路”，每个人内心的黑暗都来自外部的黑暗。顾城所理解的“一代人”之原型，即是他自己。

顾城早慧，但孤僻，不近人群，喜欢自然生态，极度排斥北京的生活空间，童年及少年时期的顾城打从心里拒绝了现实世界，拒绝所有的体制和价值。1969年随父亲离开北京城，此后五年间顾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世界，也尝试让世界接受他。从1971年到1977年，他写了不少工农兵文艺风格的诗作，令人想不到的是他

13 顾城：《顾城诗全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283页。

14 顾彬着，范劭等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

从1972年开始努力投身社会、加入共青团，在街道集体所有制单位做过木工、油漆工、翻糖工、商店营业员等，后来又在报社和杂志社担任文职，全心全意做好《延安讲话》所倡导的“革命战争机器”当中的一枚螺丝钉角色。这番经历，让顾城对人生有了真实的体验。在1978年10月，他写下对社会主义劳动体制充满批评和讥讽的《徒工与螺丝钉》（1978），五个月後他说：“我醒来，/就看见了这个世界，/那么无耻又那么堂皇”¹⁵，“肮脏！肮脏！/到处是腐水，浓汁，泥浆”¹⁶。这两首各六行的短诗写得粗糙，毫无诗质可言，是一般顾城诗歌研究不会讨论的劣品，它们写在1979年3月，比《一代人》早一个月，很忠实的反映了他对世界的厌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究竟洞悉了什么？

小小螺丝钉的折断，跟诗歌启蒙的大环境氛围有关。

顾城在1978年停止工农兵诗歌写作，处女诗集《无名的小花》挟带着他的名声和眼睛闯进一个崭新的诗歌世界，北京文艺小圈子的知青交流，以及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今天》，在他内心深处产生巨大的冲击，像一夜顿悟的僧人，顾城总结了之前的经历，重新发现了、找回了自己，毅然唾弃宛如机器运作的社会主义体制，折断奉行数年的工农兵小螺丝钉意识，遂写下《一代人》。顾城在这个大彻大悟的1979年4月还写下“大批大批的人类，/在寻找生命和信仰的归宿。”¹⁷，“广场，/充满了不平，/凝聚着泪水的盐；/纪念碑，/空空落落，/佩戴着花圈和铁链。”¹⁸当时中国并没有发生特别显眼的政治事件，京城里的政治符号还是老样子，顾城的感触不是突发的，是长久的沉积，他是新诗潮中的“被启蒙者”，觉醒后，迅速转身成为跟北岛并肩的“启蒙者”。

这个角色逆转，背后产生了一时难以察觉的危机。表面上看来，顾城历经了自甘沉溺数年的黑夜，如今那些负面的事物却助他打开了一双具有洞悉力的慧眼，重新审视过去和当前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持续从大自然美好的事物中提炼出童话特质，让心灵甜甜的住进去。他暂未警觉到现实中的黑暗事物竟然占据了如此庞大的

15 顾城：《我醒来》，《顾城诗全集》，第282页。

16 顾城：《肮脏》，《顾城诗全集》，第281页。

17 顾城：《时代》，《顾城诗全集》，第283页。

18 顾城：《四月》，《顾城诗全集》，第285页。

比重。顾城是感性思维取向的诗人，没受过完整的学院训练，很多事物是用眼睛去揣测，去揣想蕴藏其中的真谛。他说过一段听起来颇具哲理（但缺乏学理支持的）的话：

我看见青铜器上的花纹，上边有一个个圆圆的眼睛，像婴儿一样圆圆地睁着，看着世界，他们对世界感到惊讶；我看到很多古代的最早的文化，它们中间都有这样圆圆的眼睛，惊讶地看着世界，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但是很快，他们的表情改变了，在希腊雕塑中间也可以看得很明显，我在大英博物馆，在罗浮宫，前不久我刚看了这些希腊雕塑，最早他们对世界也有这样一个表情——希望，接着他们好像知道了一点儿，他们开始笑；但是很快耶稣出现了——痛苦；很快现代主义出现了——绝望。这好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顺序，西方一步一步地由惊讶到痛苦到绝望，中国这个过程在哪里，它非常短，它由惊讶很快就不惊讶了。我们可以看见佛像的眼睛，他什么都知道，他不惊讶。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清楚，在两千多年前，甚至在三千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了，宇宙是荒凉的，天地有一个规律，天道无情，人不过是它中间的极其细微的一小部分，甚至作为整个无限的存在来讲，天地时间也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没有任何价值可言。¹⁹

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史绝非像他理解的那么简单，佛像的眼睛透露的不是佛的本意，是无名工匠的审美想像，从垂目到怒目皆是。顾城有他看待事物的角度，他喜欢用“黑眼睛”重构他喜欢和讨厌的两种外在世界，所以他的诗富有画面感，往往童心未泯（即使是批判现实，仍带上一种跟年龄逆道而行的童趣）。顾城有时会为他的诗取一个明亮的篇名，诱导读者去顾名思义（或望文生义），譬如《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1981），其实他构筑的世界非常阴暗，强大的洞悉力带他深入一般人不愿意揭露的真实：

19 顾城：《恢复生命——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稿》，《壹读》，2020年7月28日，网址：<https://read01.com/kz2EMJd.html>，检索日期：2021/03/20。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人们走来走去
 他们围绕着自己
 像一匹匹马
 围绕着木桩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偶尔，也有蒲公英飞舞
 没有谁告诉他们
 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远去
 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
 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
 不会丢下一穗大麦²⁰

他跟北岛、江河等人最大的不同，在于面对事物的态度：北岛采取明面的进攻或抵抗，像战士又似烈士，似乎每个动作都经过冷静评估，并预测了读者的阅读反应，因此言说的分贝嘹亮且雄浑，加上议题化的导向，故能达到最大值的广场效应。顾城是往个人存在的幽黯面挖掘，以此诗为例，表面上是准备歌颂一个宽大明亮的世界，结果是揭露了“自我的缺席”。这世界看起来宽大明亮，其实人们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困住（极可能是蒙昧的思想），尽管改革开放了，但思想深处已经埋下自我审查与自我束缚，甚至构成一种足以延续一生的政治人格。即使偶有体制内的突围者，但也走不远。国家机器的力量无所不在，各种社会制度形成的牢笼效果，是无所不在的。更黑暗的死亡在围捕，连一穗大麦都不放过，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人可以成功遁逃，连死都不行。

这个结尾太过灰暗，顾城的黑眼睛，没有在寻找光明，而是寻找更黑的黑暗。

此诗距离《一代人》的发表才两年，顾城发现这个现实世界是所有痛苦的来源，他非常努力的在诗歌里建构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同时残酷地摧毁它。他的另一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

20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732-733 页。

也是两段式的 U 转，诗的开端写得明亮，像长不大的孩子，他说：

也许
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²¹

顾城用 1980 年代最清新、甘甜的语言，勾勒一幅美好的愿景，“任性”一词，没有比它更生动的说法了。顾城在此埋下很容易令人忽略的关键词“也许”。原来这一切都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包括“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这回事，他在“也许”的假设情境中借由自己的任性，“在大地上 / 画满窗子 /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 都习惯光明”²²，他终于知道这一代人都有“黑色的眼睛”，但未必能适应光明，也很难寻找到真正的光明，他的天真造就了生命更大的虚无，而且是徒劳无功的虚无“在大地上画满窗子”。最后，他照例毁掉一切，没有任何缘由地彻底毁掉心中所有的渴望，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的时刻。在最后三行，顾城道出原委：

我是一个孩子
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21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674-675 页。

22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 676 页。

我任性²³

顾城觉得那些美好事物本该是理所当然的，如今非得透过“任性”才有机会获得；然而，任性得要有靠山才能得逞，至少要有一个会把孩子宠坏的妈妈，很遗憾的，对一代人而言，那个妈妈只是被幻想出来的，她成不了靠山，所以再怎么任性都没用，一切希望都落空。顾城是在绝境里给自己划一开不了的扇窗，加深自己在现实里的绝望。

1981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国家前景一片看好，顾城为何依旧陷落在黑暗中呢？这跟前述“三崛起”的文坛氛围恐怕脱不了干系，三崛起和朦胧诗正遭受举国文人的挞伐，影响了顾城对外在世界的感受：国家经济发展成什么样子跟他无关，唯有诗坛的黑暗力量对他产生直接的精神压力，因此他不断建构黑暗的现实世界，再把自己封印在狭小的心灵幽室，与世绝缘，成了拒绝长大的孩子。

刘春（1974-）曾经很生动的比较过北岛和顾城的气质：“无论从人生经历还是诗歌取向，北岛身上都具有一种勇于怀疑和担当的英雄气质，这种形象高大而倔强，令人尊敬和仰望。而顾城则像一个纯真的孩子，用天真的目光打量世界。北岛坚决、刚硬，毫不妥协；顾城稚气、单纯，充满童心”²⁴。上述两首诗写于1981年的诗，暴露了童话诗人的内心黑暗，诗歌里天真甜美的童话世界，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像德国“新天鹅堡”（Schloss Neuschwanstein）的高耸城墙，安安稳稳地挡住外面女巫和人狼横行的黑森林。顾城把自己关在最高的尖塔上面，却不期待任何人的救援。

顾城不是徐敬亚，他没有论述能力，今天派或全体朦胧诗人都没有正式发表任何诗学理论（除了杨炼从自身诗歌内部建构起一个只适用于自己的“智力空间”理论），他们选择用诗，直接透过大量的诗作来创建一个跟十七年、文革完全不同的诗学体系。后续的理论建设工作，主要从徐敬亚那篇《崛起的诗群》延伸出更多精微

23 顾城：《顾城诗全集》，第677页。

24 刘春：《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一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的论述和研究专著。

结语

跟五四初期的诗歌一样，朦胧诗的形成除了诸多内在因素之外，构成诗歌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西方文艺思潮。在文革期间，主要以黄皮书和灰皮书为传抄对象，英、美、俄、法等国的经典名著，对白洋淀诗群和后来的今天派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外国作家访华而造成巨大的回响与影响的，首推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他最重要的诗集《漫歌》（*Canto General*, 1950）在诗歌语言和意象经营手法上的惊人表现，已成为杨炼等朦胧诗人及其后进诗人的师法对象。再来，是以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学作品，在1976年正式引进中国，沙特热不但影响了伤痕文学，同时也波及朦胧诗。存在主义对“自我”（ego）的寻索，启蒙了新诗潮，有个人情感和思维的“自我”，就在朦胧诗里甦醒过来。有了自我，才有承担意识。承担“一代人”的存在重量，是朦胧诗人的主要精神意识和自我期许，也因此形成新时代的“代言人”的英雄主义色彩。“立言与代言是传统文化人承担精神价值、传承文化思想的两种言说方式。……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首先以代言这一言说方式衔接了五四的启蒙传统”²⁵，北岛展现了强劲的抵抗性姿态，挑战了天安门城墙上的太阳；杨炼和江河选择在大写的文化和史诗领域，开疆辟土，写下雄浑的诗篇，那是“大写的今天”，从诗歌语言到思想意识的表现都是朦胧诗的核心价值所在；而顾城，还是那个任性的孩子，以高超的诗歌技艺，走在他臆想中宽大明亮（其实是黑暗）的世界，留下大量良莠不齐的诗作；舒婷则持续使用柔软的抒情，去征服那些受够了党国主题的读者，虽然效果是短暂的。

从白洋淀的酝酿、“三崛起”对朦胧诗美学的形塑，到顾城诗歌的觉醒，这构成了一段朦胧诗的前史。其后，北岛诗歌在全中国诗坛掀起了巨大影响力，更成就了一个“大写的今天”²⁶。

25 陈力君：《代言与立言：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嬗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9页。

26 “大写”，实为“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本文重新定义的一种比较诗意的说法，其中又隐含了不拘小节的“大写意”味道。